

設，並就地獲得人力與若干物資；(三)阻遏中東親共國家之繼續發展，增加中東中立國家對民主集團之信賴；(四)掌握亞歐非三洲間陸海空交通之中心地區，確保若干主要之石油產地。

四

蘇俄久有鯨吞中東俾可南出之野心，然由於土伊地形易守難攻，且有此一公約之組織，更不敢力取，所以深感困惱而無時不設法以謀略突破此一環形包圍。伊拉克之脫離中部公約組織，自不可謂非蘇俄之勝利，但不論伊拉克之軍力或對俄之戰略位置，在中部公約組織中所佔之比重最微小，所以蘇俄此一勝利之價值頗為有限；況共黨迄猶未能完全掌握伊拉克之軍政實權，民主集團僅在石油及威信方面稍蒙損失而已。最近舉行之第九次外長會議中，土、伊

、巴當局之反共意志堅強如前，美英亦有積極加強合作之決心，誠為民主集團之良好成就。但為中部公約組織之軍經實力繼續發展增強及不使若干傾向民主集團之國家認為土、伊、巴與美英合作之舉可能成爲冒險計，美英對中東問題猶需要更密切之合作，尤其美國應採取其前副總統尼克遜於本(五)月十一日在舊金山向報界所表示必須不以空談爭取盟邦之意見。

最後，深覺美英既明知共黨之危險性及反共乃屬全球性，則爲求完成對共黨地區之全球環形攻防線，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中部公約組織(CENTO)外，似應以中日韓爲主體——或逕將東南亞公約組織包括於內——組成北太平洋公約組織(NPTO)此舉固有若干困難，然絕非不能克服或無法排除，否則無異西南二門加栓，而任東門洞開，智者必知決非上策！

日本對匪政策之剖析

四月二十八日

一、日本今年特別重視共匪問題之原因

近數年來日本社會黨及左翼勢力經常提出所謂承認共匪僞政權及應准其加入聯合國等問題，但在保守黨政府歷任首相如吉田茂、鳩山一郎、石橋湛山及岸信介中，除鳩山曾一度積極提倡「日匪貿易」外，餘均對此採取「靜觀政策」，至多限於民間貿易與民間人士之交流活動。一九五八年第四次日匪民間貿易協定因長崎撕毀爲

旗事件宣佈廢止後，雙方關係，幾已完全斷絕。去年日本安保騷動，池田勇人繼岸信介出任新閣，在外交政策上標榜「前進」與「彈性」，並聲言大選後謀求打開日匪關係。共匪見有機可乘，在池田組閣不久，即派劉匪寧一率團訪日，試探日本態度。周匪恩來亦提出所謂「對日貿易三原則」，誘惑日本工商界人士，一面大批邀請日本親共份子訪匪。各報章雜誌，亦競載討論對匪政策之文章。加以美民主黨甘迺迺當選執政，日本一般人士認爲美新政府對外交

策，尤其是對匪政策將有變化，竟有人主張日本應在美國允許共匪加入聯合國前搶先承認共匪政權者。同時鑑於十五屆聯大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投票時，因亞非新興國家棄權者增加，僅以四十二票對三十四票較多數通過美國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一年之提案。因此認為共匪加入聯合國之可能性日見增加，日本政府亦特別考慮對匪關係。因有上述各種原因，所謂「中國問題」，在日本已鬧得甚囂塵上。且池田首相已決定在本年六月應邀訪美，共匪問題預料必為池田與甘迺迪會談之主要議題，池田默察國內外情勢，認為對匪政策，有重行檢討必要。除在內閣特別設置「外交問題懇談會」，聘請學者專家及勞工領袖三十八人從事研討外，在自由民主黨外交調查會內特設「中國」問題委員會，專責研究共匪問題。池田內閣之重視對匪問題，由此可見。

二 日本對匪政策之初步結論

日本內閣外交問題座談會係去年八月成立，至本年三月先後舉行會議十三次，其中除討論一般外交問題外，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七次會議起至三月七日第十三次會議止，係專門討論共匪問題，由經濟評論家木內信胤主持其事。在會議進行中，意見極為分歧，尤其討論「日本對匪政策」一項，形成兩種對立情勢。比較慎重一派以木內信胤為代表，認為共匪威脅世界和平，日本不能輕率承認，否則不但影響對中華民國、東南亞公約組織各國及美國之關係，且對世界和平有害。而另一派所謂「積極論」者以前茶水大學校長蠟山政道為代表，主張共匪應在適當時期加入聯合國，然後再予正式承認，對中華民國地位，暫時維持現狀，在聯合國監督下，成為非武装中立地帶，十年後由居民投票決定。因該會既非決策機構，又非諮詢機構，且無決議，故座談結果，毋須求得一致之結論。

日本對匪政策之剖析

因此該會除共同認為日本對匪政策必須採自主態度，不應任意追隨美國或屈服於共匪威脅外，將「慎重論」與「積極論」兩派意見，一併送請政府參考。在日本外務省內部之幹部會及政策企劃委員會對共匪問題之研究亦產生「慎重」與「積極」兩論，無法獲得肯定之結論。及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某元老外交家——判斷係吉田茂首相無疑——在日本東京新聞匿名發表：「日本不應急於承認共匪」之長篇專論後，對政府及黨決策部門，似已發生極大之影響。自由民主黨外交調查會「中國」委員會在四月十八日向池田首相所提出之中間報告，態度已較明朗與肯定，綜合日本各大報透露，其大要如下：

(一)承認共匪問題——日本已承認中華民國為合法政府並與之締結和約；雖然「中共」在中國大陸控制六億人口已達十年之事實無法否定，但日本不能不考慮與中華民國之關係來決定承認「中共」問題。同時更應考慮承認「中共」後對日本國內治安體制及安保體制之影響。就目前情形，承認「中共」之條件，尚嫌不足。

(二)中國代表權問題——聯大自一九五一年起即以「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一年」案處理中國問題，但由於亞非國家棄權者增加，且英聯邦諸國中亦有主張「中共」應參加裁軍會議者，故預料本年聯大在討論「中共」入會問題時，雖然「兩個中國」在本屆聯大尚不致出現，但日本必須與美國、英聯邦、亞非諸國密切聯繫，依照國際情勢之發展，慎重處斷。

(三)台灣地位問題——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已聲明放棄台灣主權，其歸屬問題已無權發言，惟日本對台灣未來地位抱有極大之關心。就日本立場，為維持日本與遠東之和平，不容台灣淪入共產集團勢力之內。

(四)日匪貿易問題——目前雖有人主張締結雙方政府間貿易協定

，在締約同時，發表一項締結政府協定與承認「中共」政權無關之聲明。但就實質而論，兩者無法分開。且「中共」認爲欲簽訂政府間協定，必須日本政府有承認「中共」之意向與行動，故目前欲不談承認而簽訂政府間協定尙無可能，只有期望於民間貿易之擴大。

三 日本對匪政策之可能發展

「共匪問題」原已極爲複雜，在日本歷屆內閣中，對匪問題爲最難於解決之課題，並爲政黨間政爭之工具，且有「制匪日問題者制天下」之論。池田勇人組閣之後，內有社會黨等革新勢力之壓迫及自民黨內部意見分歧之影響，外受國際姑息主義之衝擊與匪俄之利誘威脅，使池田政府對共匪政權之態度，搖擺不定，徬徨無策。報章輿論，論說紛紜，莫衷一是。內閣外交問題懇談會及外務省等所提出報告，又無肯定之結論，池田首相始終未作正式之表示，造成對匪政策之真空狀態，爲日本愛國人士所憂慮。吉田茂前首相遂於三月三十一日發表匿名專論，坦率表示日本改變對共匪態度之時機尙未到來，不應急急於承認「中共」政權。彼認爲決不能草率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爭先承認「中共」更非確保日本國家人民安全之道。「中共」問題惟有在世界歷史潮流中謀求解決。日本決不能破壞目前國際政治均勢，要求當局慎重處理。一面並指出國際共產黨正策動日本中立化以破壞此種均勢。革新勢力亦正與之呼應並不斷離間日美關係。繼謂早日承認「中共」及促進「中共」加入聯合國之論，與策動中立主義之動向有互爲表裏關係。吉田氏於此時發表該項重要論文，實爲適時之舉，爲絕大多數國民所同情與支持。不但有領導輿論澄清觀念作用，且將影響池田以下政府決策人士對匪之決策。何況在實際上吉田茂對池田內閣之影響力極大。在另一方面

面美甘迺迪總統與英麥米倫首相舉行會談後，甘迺迪於四月十二日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彼已明確告知麥米倫首相，美國將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且將繼續履行其對中華民國政府之承諾。美國對中國之堅定態度，亦必影響池田政府之決策。四月十八日自民黨外交調查會「中國」委員會對中國問題之報告，態度已較堅定，與吉田茂前首相之觀點甚爲接近，預料將爲政府當局所採納。就目前情勢，日本有識之士均已認清台灣地位對日本乃至遠東安全與和平之重要性，不容其淪入共黨勢力範圍。因此日本政府當局決不致採取爲害國家安全之愚蠢行動盲目承認共匪。且最近自民黨內各實力份子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石井光次郎、藤山愛一郎，積極倡導促進日韓關係。彼等認爲爲日本和平與安全，必須阻止南韓與台灣之被赤化，因此促進日韓關係應較日匪問題爲重要。在自民黨外交調查會內又新設「日韓關係推進懇談會」，由石井光次郎主持其事。在四月二十五日所舉行之一次會議中，除上述諸氏外連三木武夫亦親自參加，大野伴陸及河野一郎雖在國外，亦派代表出席。會後岸與石井兩氏並親訪池田首相，傳達會中各派意見及其決定。此項意見，無疑對政府決定對匪政策亦有重大影響。

綜合以上情勢，池田內閣對匪政策，目前尙未完全決定，但預料將仍採取與岸內閣時代相同之「靜觀政策」，並與美國遠東政策相配合，慎重處理。至於日匪貿易問題，過去若干人士抱有極大希望，認爲係日本謀打開日匪關係之原因。但十餘年來，證明日本經濟發展與繁榮，依存中國大陸之成份不大。據日本專家估計，日匪間貿易開放後每年貿易額最高亦不致超過一億美元，池田首相對此亦有深刻認識，故判斷日匪間至多發展民間貿易與相互訪問，且其幅度亦不致太大。